

中国古代作家 作品研究方法

ZHONGGUO GUDAI ZUOJIA ZUOPIN YANJIU FANGFA DAOLUN

王雨容 编

导论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作家 作品研究方法

王德威 著

王德威 著

文学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导论

王雨容 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导论 / 王雨容编.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43-3526-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研究方法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1732 号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导论

王雨容 编

责任编辑	罗小红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65 千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526-7
定 价	22.00 元

课件咨询电话: 028-87600533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凯里学院规划教材编委会

主任 张雪梅

副主任 郑茂刚 廖 雨 龙文明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名)

丁光军 刘玉林 李丽红

李 斌 肖育军 吴永忠

张锦华 陈洪波 范连生

罗永常 岳 莉 赵 萍

唐文华 黄平波 粟 燕

曾梦宇 谢贵华

办公室主任 廖 雨

办公室成员 吴 华 吴 芳

总 序

教材建设是高校教学内涵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条件。凯里学院 2006 年升本以来，十分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在教材选用上明确要求“本科教材必须使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和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从而保证了教材质量，为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这类适用于研究型本科院校使用的系列教材，多数内容较深、难度较大，不一定适合我校的学生使用，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也不完全切合，从而制约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探索和建设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校本教材、特色教材成为我校教材建设的迫切任务。自 2008 年起，学校开始了校本特色教材开发的探索与尝试，首批资助出版了 11 本原生态民族文化特色课程丛书，主要有《黔东南州情》、《苗侗文化概论》、《苗族法制史》、《苗族民间诗歌》、《黔东南民族民间体育》、《黔东南民族民间音乐概论》、《黔东南方言学导论》、《苗侗民间工艺美术》、《苗侗服饰及蜡染艺术》等。该校本特色教材丛书的出版，弥补了我校在校本教材建设上的空白，为深入开展校本教材建设积累了经验，并对探索保护、传承、弘扬与开发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推进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我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荣获贵州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当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和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地方本科高校在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办学特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框架下，积极探索和建设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在此背景下，根据我校人才培养方案和“十二五”教材建设规划，结合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又启动了第二批校本教材的立项研究工作，通过申报、论证、评审、立项等环节确定了教材建设的选题范围，第二套校本教材建设项目分为基础课类、应用技术类、素质课类、教材教法等四类，在凯里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的组织、指导和教材编著者们的辛勤编撰下，目

前，15本教材的编撰工作已基本完成，即将正式出版。这套教材丛书既是近年来我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最新成果，反映了学校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学校由“重视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凯里学院校本规划教材丛书的编辑出版，集中体现了学校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建设努力，倾注了编著教师团队成员的大量心血，将有助于推动地方院校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然而，由于编写时间紧，加之编著者理论和实践能力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错漏。我们期待在教材使用过程中获得批评意见、改进建议和专家指导，以使之日臻完善。

凯里学院规划教材编委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前 言

“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为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专业必选课程之一。一直以来，没有固定的教材。各任课教师都根据自身情况自编讲义。据笔者了解，大多数教师常常将这门课作为知识性的介绍，介绍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情况及研究现状，这当然也是一种教学方法。但笔者认为，那些有关作家作品的情况在文学史课程中都已经涉及，无需重复，故我在上这门课时，意在改变这一情况，想通过介绍一些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方法，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路径，以便于在毕业论文的撰写时能有所指导意义。

这本教材，是根据我两次担任“古代作家作品研究”课程的讲义修订而成的。我于2010年下学期接手这门课时，被告知没有教材，于是边授课，边编写讲义。在编讲义时，我深受王兆鹏先生《词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的启发。兆鹏先生此书，着重讲考证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阅读此书后，读者能很快掌握，并按照书中所介绍的程序步骤去实践。考证一法，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都是最基本且很实用的方法。因此我在设计讲义时，考虑到当今一般院校的本科生对中文工具书的使用尚未掌握的情况，首先介绍一些常用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意将文献和工具书作为两个主要的内容。现在，西方各种理论充斥国内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也引进了许多文艺学理论方法，诸如心理学、阐释学、符号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各种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古代文学的研究空间。当然，面对如此多的方法，不可能一一介绍。笔者从地方院校的情况出发，选择了三种入门快、易于操作的方法，即文献学方法、逻辑学方法、传播学方法。

本教材分为五章。第一章作家作品研究的要求，介绍两个内容：一是作家作品研究方法，提出考据和阐释是作家作品研究的两大基本能力，二是介绍作家作品研究的读书方法。第二章，中文工具书的使用，对中文工具书的性质作用及分类等知识介绍之后，重点对常用文史类工具书的使用方法进行介绍。第三章，文献学方法，从目录学、文集版本、作品笺注、作家考辨等四个方面进行指导。第四章，逻辑学研究方法，对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批评法这四种方法进行介绍。第五章，传播学研究方法，按照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to whom）、通过什么途径（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模式，这一模式产生了五大基本内容：谁传播、传播什么、对谁传播、传播途径、传播效果，于是就有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接受者、传播效

果五个方面的研究，本章逐一介绍。每节主要由导论、研究实例分析、延伸阅读书目和思考与研究四个板块组成，突出理论与实践结合、讲解和练习结合的特点。

这本教材，虽然以古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为中心，但并不局限于古代文学研究，也适合于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笔者以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为例，重点讲解古代文学中作品和作家实证研究的操作程序和方法窍门，力图让不懂研究的本科生能尽快找到考证的入门途径，学会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如果有教师能用本书作为教材，我建议，教师应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学生，引导督促学生进行练习实践，让学生每学完一节内容，就做一次练习，每节后面的思考练习可以选择性去做；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如何选题、如何搜集资料、如何整理资料、如何运用资料、如何发现线索、如何解决问题。多练习、多实践，真正将研究方法熟练运用，才是本课程所要达到的目的。

由讲义变成教材，是我梦寐以求的事，首先要感谢学校相关领导，他们让我的这本教材成为学校本年度的规划教材，并很快进行出版；其次要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钦佩，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减少了许多瑕疵。

笔者诚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教，以便今后能进一步地完善。

王雨容

2014年9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作家作品研究的要求	1
第一节 作家作品研究方法漫谈	1
第二节 古代作家作品研究读书法	5
第二章 中文工具书的使用	13
第一节 工具书的性质与作用	13
第二节 工具书的分类	15
第三节 常用文史类工具书的使用方法	17
第三章 运用文献学方法	41
第一节 运用目录学工具书指导研究	41
第二节 文集版本研究方法	50
第三节 作品笺注的方法	64
第四节 作家考辨的方法	69
第四章 运用逻辑学研究方法	81
第一节 归纳法	81
第二节 演绎法	86
第三节 比较法	94
第四节 批判法	102
第五章 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	111
第一节 关于传播者的研究	111
第二节 关于传播内容的研究	121
第三节 关于传播方式的研究	129
第四节 关于接受者的研究	139
第五节 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	147
参考文献	161

第一章

作家作品研究的要求

第一节 作家作品研究方法漫谈

一、导 论

这门课叫“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不是知识的介绍，而是研究方法的指导。学术研究，对我们本科生来说，还只是刚接触，所以，一些方法的指导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两大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古代中国是一个重“道”、重“体”、重“形而上”的国度，看重的是理论，而对理论的获得过程并不关心。五四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大批学者从海外归来，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现代化进程，比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胡适先生是其代表人物，许冠三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二十世纪的名学人中，胡适（1891—1962）是最先由方法自觉的一位。远在求学时期，他已知以西洋传统逻辑作批判工具，并发下宏愿，要以西洋方法用于中国古籍的研究。1915—1916年间，他已意识到思维术与哲学兴衰进退的关系，接受了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暗示，相信思维方法的革新实含蕴哲学的改造与进化，于是便选定先秦名学进化史为题，写成他的博士论文。因此，在历史研究领域，他也是讲求方法的先锋。”^①

胡适另有许多谈方法的文章，如《研究国故的方法》《考证方法之来历》《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

方法的使用，可以提供一些更加有效、简捷的途径。梁启超认为做学问若得法，则事半功倍。他曾说：

“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来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②

这与傅斯年的“凡一门学科能扩充其工具的便进步，否则便退步”是同一个意思。

不过，方法的使用，要考虑学科特点。像我们的古代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还是我们老祖宗的传统考证方法，如果脱离基本的文献，那是要误入歧途的。周勋初先生对那种滥用西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0页。

② 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载于《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8页。

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况，有过批判。他说：

“由于国外各种思潮的涌入，学术界也常有人介绍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一九八五年前后，提倡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人很多，但仅仅停留在介绍与宣传上，未见研究成功的实例，结果历时不久即自行消歇。由于社会上趋新成风，学术界也相应地兴起阵阵新风，经过多次折腾之后，大家也就慢慢地体会到，文史不分的传统研究方法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欧美学者常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原型研究等方法，也有人使用，但还未见规模宏大的成功之作。这些方法适用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我国古代文学情况有别，因此使用这些外来的方法，还得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作出是否适用的结论。”^①

因为中西文学有差异，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也必然会有差异。文学研究和研究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对象要求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往往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来确立文学研究的对象。阿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提出文学的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和观众。与研究对象相应，文学研究方法也形成了四个方面：一是作家角度，比如文艺社会学研究法、传记研究法、精神分析法、原型研究法等；二是作品角度，如符合学研究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结构与解构研究法；三是读者角度，如解释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等；四是世界角度，如社会文化研究、后现代文艺美学研究法、新历史主义研究法等。我们这门课程，依然会将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作为重点来讲，然后介绍一些逻辑方法，从思维上训练同学们，最后介绍一种最易于操作的传播学的方法。

接下来，谈谈进行作家作品研究所要具备的基本功。作家作品研究有三个基本功：熟读作品、熟悉史料、熟悉理论。

作品，是我们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做考据还是做理论阐释，都要细读作品。西方有所谓“细读文本”的方法，是很适用、很必要的。“细读”作品文本，是做文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素质。你不熟悉作品，分析作家的艺术个性就无从谈起。对作品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不能自我判断作品的优劣好坏，就无法评判作家的贡献和地位。大家原来读文学史，脑海里填满的是中国文学史的各种现象、流派，有哪些作家，这些作家艺术上有什么特点、内容上有何特点、在文学史上有何地位等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是要了解，尤其是应考时需要。但要写论文，就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要发现问题，就要熟读作品，多读作品。搞作家研究，读选本不行，要读熟、读透作家的全部作品。通过阅读作品，让这个作家在你心中活起来，能想象他的音容笑貌，能感受他的喜怒哀乐，能走进他的心灵世界，能把握他的精神个性。通过对一个作家的解剖，逐步掌握分析作家作品的方法和途径。

熟悉史料，也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我们研究古典文学，需要穿越历史的屏障，进入古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和创作语境。我们读当代的小说、戏曲，读完后能立刻就明白它讲的什么背景，作品中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么说、这么做，并且能够感同身受。而读古典的作品，可能我们知道作者写的是什么，但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而要了解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就必须熟悉相关史料文献。有同学认为，我读了《中国通史》，读了《隋唐五代史》，读了《宋代史》，就对唐宋时期的历史很熟悉了。这还远远不够。近人写的历史著作，是“第二历史”，是历史学家建构

^① 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出来的历史，而不是本源的历史，不是活生生的历史，更不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个体化、独特的作家生存状态史。我们要有自己心目中的历史，要自己穿越历史时空，去体会作家生存的历史环境，感受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就需要阅读原始史料，读史学原典，通过史料来还原历史。

历史原典，包括正史、野史。比如，你要了解宋南渡时期作家的生存状态、文化环境，至少应该读一读《宋史》《宋史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等正史著作，还应该读一读《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挥麈录》《鹤林玉露》等野史笔记。

理论，也不能忽视。作品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出发点，史料和理论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两个支撑点。没有史料，研究古代文学就失去了根基；没有理论，就没有思想活力和思维方向。仅仅是熟悉作品，掌握了史料，而没有一定的理论做指导，就难以找到分析问题的视角、方法和途径，有时甚至找不到一个学理性的概念、范畴来表述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论述问题也很难有深度和高度。读了作品，会有一些感性的体悟，如果没有理论，就难以将这些体悟从感性提升到理性，就难以将自己的感受、思考提炼成具有普适性、规律性的学术观点。理论，可以启发思维，打开思路，转换视角，提供方法。

理论，又指哪些理论呢？首先当然指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都要熟悉和了解。此外，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传播学等理论，也要留心学习。

作家作品研究有两个基本能力：考据和诠释。考据是实证性的研究，是对事实真伪的判断；诠释是理论性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价值判断。考据回答的是“是与不是”的问题；诠释回答的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或者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

二、选文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①

张伯伟

每一时代的学术，皆有其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为了解决问题，走出困境，就需要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新的理念、材料和方法。各门不同学科所面对的，往往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而由各种具体问题归结起来的共同点，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问题，正如禅宗所说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②。中国学术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始于二十世纪初。如果学术之升降以百年而论的话，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初的关心学术前途、承担学术命运的学者来讲，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思考起点。

中国的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冲击和启示下形成的。而在世界范围内的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研究，尽管有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转变，但说到底，也都是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以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应当看到，在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启示下，中国学术曾经

^① 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载于《中国文化》2009年第2期，第107-116页。本书引用时略有改动。

^② 玄觉：《永嘉证道歌》，载于《大藏经》第四十八册，第396页。

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仍然可能继续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胡适当年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而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傅斯年 1928 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①他所想“借”的“几个不陈的工具”，说穿了也是西洋的方法。陈寅恪在 1934 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经以王氏为例，举出其学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三项原因，前两项都属于材料方面（地上和地下，异族和汉族），列于第三的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然而不幸的是，此后汗牛充栋的论著，其绝大部分早已不是什么“参证”，外来的观念和方法愈演愈烈为学术研究的起点（提问方式）和终点（最后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邀请严耕望前往任教之时，钱穆的反应是：“应该讲讲，给青年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研究该如何做了。”^②撇开个人的学术恩怨和偏见不谈，这也代表了本土知识人对于二十世纪学术方法的一种看法和意见。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正在使自身由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在经济上，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但这种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的注意和承认。那么，在学术上，中国的知识人能否提出并实践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呢？这，就是我所体认到的当代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

……

（本书作者按：中间省去了一些内容，主要是谈前人的思考。有西方的异域视野，像美国保罗·柯文的《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还有一个是日本的沟口雄三，他有部书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这两部著作都是对西方中心说的挑战，强调了中国历史以自身内部为出发点，即所谓“中国中心观”。）

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用以概括十多年来我在学术上的一个努力方向，也试图对当代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作一个初步的回应。

……

张伯伟先生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汉文化圈。所谓汉文化圈就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地区，如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等地区。它有四大要素，一是汉字文化，二是儒教，三是律令制，四是佛教。

然后总结了汉文化圈的方法有三个方面：

其一，文学典籍的流传。研究典籍的流传，他概括了十个方面，即从书目、史书、日记、文集、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印章和实物等方面来考察。他举了袁枚的《随园诗话》为例，在日本是大受欢迎，而在朝鲜则不怎么待见，中国也是毁誉参半，章学诚就曾严厉地批判。

其二，文人学士的交往。因他谈的都是中日或中韩的交往，与我们无关，故略。

其三，文化意象的嬗变。他以“骑驴”和“骑牛”两种意象为例，说明中国古代与日本的差异。驴是中国古代诗人喜爱的坐骑，中国文学史上以骑驴著称的诗人很多，以唐代而论，就有孟浩然、李白、杜甫、贾岛、李贺等。由于一些著名的骑驴故事和骑驴语录的流传，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步形成了诗人骑驴的意蕴。总括而言，不外两点。第一，驴是诗人特有的坐

①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四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年版，第 258 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9 页。

骑；第二，驴是诗人清高心态的象征。“骑驴”不仅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在诗人的眼里，“蹇驴”往往和“骏马”相对，它象征着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因此，这一对立是具有政治性的。而高丽和朝鲜的诗人则偏爱骑牛。到朝鲜时代，以“骑牛”作为诗人身份的象征，并且坚持在野隐逸的立场，成为一个普遍想象。

三、延伸阅读书目

- [1] 杜松柏. 国学治学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 赵敏俐. 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 [3]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台北: 东方出版社, 1996.
- [4] 周勋初.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5] 王瑶.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6] 李浩.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 [7] 赵益. 古典研究方法导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8] 胡经之, 王岳川. 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9] 金岳霖. 形式逻辑简明读本[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 [10] 赵宪章. 文艺美学方法论问题[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陈鸣树. 文艺学方法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四、思考与研究

1. 阅读一些文艺学方法论的著作，了解有关理论。
2.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如何开拓与创新？
3. 中国文学特征的形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4. 思考方法论的学习对于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5. 你认为方法论课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节 古代作家作品研究读书法

一、导 论

做研究，首先得读书。但读书也要讲究方法，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那么多的作品、作家，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只能读其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做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勤勉加方法。古人也常谈及读书法，比如朱熹就有系统的读书法，《朱子读书法》为他弟子所记，现有流传。其后元朝程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清朝徐与乔有《五经读法》等。这些都是以著作的形式系统地谈及读书方法，同时还有许多杰出的学者，都有一些零星片语表达了对读书的认识、经验或体会。古代读书法的内涵，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指导，更是某种学术思考的结果。

做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需要对相关的书籍进行有理论、有系统地学习。我们已经读了两年的汉语言文学，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是必要的，但这些文学史著作都是后人著述的，只是让我们大致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原著。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在编文学史教材时就告诫学生：“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诸君假如仅仅细心的读完了一部书，如《诗经》，或《左传》，或一大家的诗，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又把楚辞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自己会有一种见解，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所以文学史之用，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恰恰反面，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不过，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功夫，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也常常免不了‘鄙陋’，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乡下人气’。所见不广，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就要‘坐井观天’了。”^①傅斯年谈到了专和通的关系，通是为了专，专要有通的意识。前面我们已经学完了文学史，有了通的准备，下一阶段就是要开始专了。进行专门的研究时，要有些知识储备，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文献学的知识。文献学很重要，它是进行古代作家作品以致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称之为“助跑学”。文献学即过去说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程千帆先生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是“希望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精密结合。要求一方面有比较深刻的美学艺术修养，其中包括创作经验在内；另一方面要有深厚的文献学知识，要懂得版本、目录，要懂得音韵训诂，还要懂得风俗、制度等”。^②故此，程先生相当重视文献基础，现在南京大学都沿袭这个传统，给古代文学专业都开设文献学的课程。而且现在，有大量的中文工具书供大家去查阅资料，本书第二章将专门谈中文工具书的使用。

第二方面是熟读一些经典文学著作。每一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比如先秦的《诗经》《楚辞》，唐以前的文学总集——《文选》，唐代李白、杜甫的诗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明清的四大名著，这些都需要大家去熟悉。

第三方面是诸子经典和重要史书。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开出了如下书目：有《论语》《孟子》《老子》《墨子》《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等。

二、选文

本节选取王兆鹏先生发表于2001年第3期《古典文学知识》上的一篇文章《读书“五法”》的重要章节，以便读者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有效地进行学习。

读书“五法”^③

王兆鹏

一、比较法。

未入和刚入学术之门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困惑：读完了几本书，还是摸不着头绪，发

^①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②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③ 王兆鹏：《读书“五法”》，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3期，第13-22页。本书引用时略有改动。

现不了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收集材料，更谈不上去解决什么问题。遇到这种情况，不妨试一试“比较读书法”。比较的目的又有两种，一是同中求异，二是异中求同。

所谓同中求异，是就同一个专题或同一作家作品，同时找几本研究著作来阅读，看学术界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找出彼此观点的相异、相左之处。找到了相异的学术观点或结论，也就是初步发现了学术问题。两种相左的结论，如果是史实方面的问题，必有一个是错误的；如果是理解上的问题，必有一个更接近于事实。要弄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就需要找相关的材料去论证。由收集材料进而论证、解决问题，这样就可逐渐找到做学问的途径、找到做学问的“感觉”，进入做学问的“状态”。

我做学问，是从研究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当时是读大学四年级。当时为了便于掌握宋代词人的字号和生卒年，我自己编制宋代词人的字号和生卒年表，在制表过程中，比较了相关论著的记载，发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等人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就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纪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由此而写出了本科毕业论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跟随本校曾昭眠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在曾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所谓异中求同，是指读理论书籍时，要从古今中外不同的论著中寻找某一理论的支撑点或研究方法。我们这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理论的基础一开始并不很厚实，读理论著作时不容易把握其精神实质、理论体系。为了深入切实掌握一种理论方法，我常常“对读”不同的理论著作，比较其异同。我曾比较读过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书的异同，收获多多。要比较二者的异同，就要思考，思考后对原书的要义就容易记住和把握。同样的两本书，浮光掠影地各读一遍，远不如这样比较阅读的收获大。要做学问，必须熟读、精读、掌握几本“看家”的书，将这些书的理论、精神、方法深入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去，会终身受用无穷。至于哪些书该精读，哪些书可以“看家”，那就因人而异了。人的素质不同，兴趣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追求。做学问的方式不同，对于书的要求也自然不同。

二、纵横法。

研究一个作家，既要横向地阅读跟他同时的作家的文集，还要纵向地阅读他前后的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实证考据，还是进行理论分析，都须如此。比如做《张元干年谱》，仅仅依据张元干本人的文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与他同时的诗人词人的文集中挖掘资料。与张元干同时的诗人词客有数十人，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读完。我的做法是，先“精读”与他有交游唱和者的文集，从中找出与张元干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资料，然后再“泛读”跟他没有直接交往的诗人的文集，从中也发现了一些间接的资料。比张元干晚一辈的作家，虽然与张元干不会有直接的交往，但他们的文集中也会有诗文涉及张元干本人或其交游者的事迹。比如周必大的《益公题跋》，有关张元干及其友人生平事迹的题跋就很多；蔡戡《定斋集》中也有张